抗日烽火中的上海漫画家(1)

◆ 黄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漫画家积极投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滚滚洪流中。他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漫画协会，负责开展战时漫画工作，而且创办杂志，以漫画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罪行，鼓励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上海漫画家还组成宣传分队奔赴全国各地，举办抗日漫画展览，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 1937年9月20日《救亡漫画》创刊号封面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

成立以上海漫画家为主体的全国漫协战时工作委员会

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漫画家面对日本侵略军不断入侵我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和阴谋，早就创作了一系列针对日本侵略军的漫画。创刊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的上海《时代漫画》月刊，就经常发表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罪行的漫画。例如《时代漫画》第14期封面漫画《魔爪》(特伟作)，就是揭露各帝国主义列强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欲望最强烈，呈现青面獠牙的兽性，魔爪已伸到中国的疆土上。后来，由《时代漫画》编辑部发起征集作品，于1936年11月4日至8日，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四楼展览厅举办的中国漫画史上“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有更多的揭露日帝侵略、表现抗日斗争的漫画，如穆一龙的《蜿蜒南下》、高龙生的《国破山河在》等等。

举办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之后，于1937年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首批会员为入选第一届全国漫画展的作者。该会会址设于时代漫画社，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口的同和里，后迁北京路顾家弄78号。上海实际上成为全国漫画创作活动的领导中心。抗战爆发后，中华全国漫协迁武汉，在1938年2月设立“战时工作委员会”，推举叶浅予、张乐平等为委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上海漫画家，负责策划开展战时漫画工作。后来，中华全国漫协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上海。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救亡漫画》发动漫画战役

抗战爆发，上海漫画界迅速于1937年8月14日成立“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开展配合抗日战争的漫画创作宣传活动。

首先于同年9月20日创刊《救亡漫画》五日刊。该刊编委会由21名漫画家组成。《救亡漫画》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题写刊名。《救亡漫画》五日刊，每期四大开，编发大小漫画作品50幅左右，并有少量文章和报道。漫画家在这里集中力量发动了抗日救亡的第一个漫画战役。正如王敦庆在《救亡漫画》创刊号上发表的《漫画战——代发刊词》所说：“自卢沟桥抗战一起，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画界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救亡漫画》的诞生，却是我们主力的漫画战的发动。因为上海是中国漫画艺术的策源地，而这小小的五日刊又是留守上海的漫画斗士的营垒，还不说全国几百个漫画同志今后的增援，以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

蔡若虹所作的《救亡漫画》创刊号封面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形成奋起抗战无可阻挡的巨大浪潮，预示日帝侵略者必将被中华民族的抗战巨浪所淹没。张乐平在《救亡漫画》上发表了较多的抗日救亡漫画，他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用遒劲圆润的线条和写实又适当夸张的人物造型，突显出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或举钢枪，或举拳头。《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一画，则又以流畅的线条和简约的人物造型，从正面表现抗日军队已投入前线近距离消灭敌人的战斗，并且作品提出了要节约子弹、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的要求，使作品更有深意内涵。

《救亡漫画》还发表了不少报道抗日新闻的漫画，例如创刊号上发表一组题为《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的漫画，生动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解放区军民积极投入抗战的情景。

总之，《救亡漫画》五日刊是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发动抗日漫画战第一战役的一份历史记录和战报。

上海漫画家组成抗日漫画宣传队走向全国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创刊《救亡漫画》发动抗日漫画第一战役的同时，为更深入广泛地发动抗日漫画第二战役，而组建了“抗日漫画宣传队”，全称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队员有胡考、特伟、梁白波、席与群、陶今也，共七人。8月31日，漫宣队在上海铁路西站(今凯旋路长宁路口)登上列车出发，奔向各地，前后经历五年，开展抗日漫画战的持久战，在中国漫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计划要建立抗日漫画宣传队第二队和第三队，但因缺少人手而未能实现计划，所以原来的“漫画宣传队一队”之称，后来不再称“一队”，则习称“抗日漫画宣传队”。

抗日漫画宣传队隶属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出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

抗日漫画宣传队第一个工作点是当时的首都南京。漫宣队赴南京途中，与由上海爱国戏剧家组成、同属政治部三厅的抗日演剧队合作，在镇江街头宣传抗日。以抗日为主题的漫画和街头剧同时出现，轰动了长江南岸的这座古城。漫宣队还一路途经苏州、无锡，同样与抗日演剧队合作进行抗日宣传。

漫宣队抵达南京，早先已在南京的张仃、陆志庠立即加入漫宣队，从而增强了漫宣队的力量。漫宣队员们居住在叶浅予曾经在南京购置的、一度与梁白波私密同居的国府路廊东街德邻村2号，屋内设备简陋，只有一张床铺，于是大家只好打地铺艰苦就宿。而卷起铺盖，架起门板，连同简单桌椅板凳，便是漫宣队的工作场所。吃饭问题则在附近的小饭店包饭解决。队员们经过日夜奋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200余幅宣传抗日的漫画和宣传画，办起了一个大型的“抗敌漫画展览会”(展品都是画在布上，以便流动展览)，在南京市区大华电影院展出。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30.从“老同学”眼里溜走

还有一例。当投敌叛变的顾顺章得知陈赓已离开红军正在路上的消息，便指令复兴社河南分社特务站，立即派人追缉陈赓，不得有误。

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萧洒买了些鸡、肝熟食，一瓶“宝丰酒”，带回大金台旅馆他的包间，开始独酌独饮。几杯酒下肚，他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懑如火一般燃烧起来。原来他也是黄埔一期的。八年来他只能在同是一期的胡宗南手下供职，这且不说，不久前，胡宗南把戴笠推荐到蒋介石身边，深得蒋介石的欢心。戴笠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竟指挥起各省的复兴社分社。区区黄埔六期，竟骑在老大哥的脖子上拉屎拉尿！他已经是不可容忍了，又来了个郑州特务分站的站长，此人连“黄埔”都算不上，也像对待部属似的对待他……他咽不下这口气，干脆把公务推给助理书记管，自己躲进大金台旅馆，逍遥复逍遥……

一瓶酒喝下去，脸上火辣辣地发烫。他喉咙里好像堵着一团火炭，热乎乎地连说话都很费劲。他浑身热汗涔涔，走到回廊里，解开扣子扇凉。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人脸变成了两个、三个……十个！渐渐地，两个人的脸又合成了一个：眼镜、圆眼睛、翘鼻子……陈赓！他认出对面走过来的人：是他，陈赓！他一把拉住那人的胳膊，险些拖了个趔趄。他试探地问：“你是陈赓，对吧？多日不见，别来……无恙？”

一股酒意直冲那人的鼻孔。那人捂住嘴，退避着，摇摇头。

“我，我没醉。你，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萧洒……”萧洒嘴里念叨着，伸出胳膊几乎抱住那人。

那人似乎急了，用手指搔了搔隐隐显露的络腮胡须，推开萧洒的手，讲出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阿拉不姓陈，侬认错人啦！”“不会吧，你不是黄埔的？兄弟还是有爱开玩笑的老毛病！”

那人转身一推，丢出一串滚豆似的上海话：“阿拉是做生意只晓得黄浦江，不晓得啥个黄埔，侬不要拉来拉去，让人家笑话……”

萧洒像触电似的松了手，连连作揖：“本人多喝了两盅。对不起，我那个朋友跟你长得大像了，可惜他是湖南人……”

萧洒丧气地回屋躺下，呼呼地喘息，又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猛地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臭汗，连被褥都湿了。他失声大叫，两手到处乱抓：“他肯定是陈赓！没错，别人没他那样的鼻子，也没他那种笑！我要抓住他，抓住他……”

他起身找遍了整个大金台旅馆，再也没见到那人的踪影。他竖起耳朵，想听到不知是梦里还是真实中曾经响起的陈赓那一瘸一拐的脚步声，但楼道里寂静如夜，什么声音也没有。他捶胸顿足，大叫起来：“我真是只不走运的猫，到嘴的食又跑了！”

那人的确是陈赓，他又冒险从他的“老同学”眼下溜走了。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纵队离开遵义。24日，先头部队占领土城。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总是工作到很晚。行军出发前，干部团团长陈赓派作战参谋郭化若叫醒主席。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是由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的，并由军委直接领导。除陈赓任团长外，政委是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梯，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上级干部队队长是肖劲光，第四营营长是韦国清等，都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

那天，陈赓去找周恩来。他在土城街的场院里找到了他们：身着灰布棉军装的毛泽东脸色沉郁，清瘦的脸上现出淡淡的红色。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和束着牛皮腰带、别着一支小手枪的朱德在小声地商讨着什么。洛甫、王稼祥、博古、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央领导都在。

原来，林彪的一军团在土城前边的复兴场与敌军遭遇，原以为是不堪一击的黔军“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激战当中，才知道敌人不止四五个团，而是九个团，至少一万人。敌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林彪坚持打到黄昏，不得不连夜向毛泽东报告受挫的消息。

向死而生

——我修的死亡学分

李开复

7.转变过程

唐医生的回答更巧妙了：“是的，但你不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不会这样解读！”

我发现，做医学研究的人，对于统计学的理解和应用，与我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病人心理上的考虑，有些说法就不得不刻意模糊，以免造成误会。

过去，我会从自己的角度当面提出质疑，但我越来越清楚，每一种认知、观点，都因角色、立场而有所不同，无关是非对错。有了这种理解，可以免除许多争辩的烦恼。在医疗专业上，我尽量配合医生。

最后，唐医生告诉我：“如果你坚持想知道腹部残存的东西算不算是肿瘤，也可以考虑动手术切开来看。不过……”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才继续往下说：“依我的评估，手术只有风险而没有好处，真的没什么必要。”

我接受了唐医生的建议，先不管腹部到底怎么了，接下来每三个月接受一次标靶药物治疗，每次约两小时。然后每六个月做一次磁共振成像检查。虽然可侦测到的肿瘤变少了，但是，不能被称作肿瘤的“东西”存在我的体内。我也更清楚地知道，会形成这些肿瘤的“我”的身体环境，倘若没有彻底改变，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对我展开下一波的攻击。这才是我必须认真面对的、另一阶段的漫长治疗。

癌症病人在被确诊罹病之后，第一时间一定是不断反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是我？”理智一点的人，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开始仔细反思，也许就会理出一点蛛丝马迹；尽管这些蛛丝马迹未必真的就是致癌因素，但是，有机会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个性、处世态度做全盘的省思，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

我总是努力把“拼命”当作自己的标签，从来不理会身体已经不断对我发出警告；寻常生活中的小病小痛，我都不当一回事，随便吃点儿药，就马马虎虎混过去了。睡不好，就吃安眠药；精神不济，就猛灌咖啡。反正工作优先、业绩第一，社交网站兴起，我玩出了兴头，还要求自己每天维持至少发10条微博的“纪律”。紧凑的生活确实让我活得精彩，可是无形的压力却慢慢累积在身体里面，以滴水穿石的力道，侵蚀着我的健康。

说到压力，我过去总自认为有超出常人的抗压能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大小小的事，我大抵都能过关斩将、顺利通过。直到生病了，我读了一些好书，我才发现，结识了许多有修养、有智慧的朋友，压力不一定来自忧虑、紧张、急躁、愤怒等情绪；争强好胜、期望、等待、兴奋，甚至像我过去一直怀有的“改变世界”、让“世界因我不同”的企图心，稍有不慎，就会在体内留下难以清除的“毒素”。

如果不是癌症，我可能会循着过去的惯性继续走下去，也许我可以获取更优渥的名利地位、创造更多成功的故事，如今，癌症把我硬生生推到生死界限，我才终于看清楚这一切。

这场大病，让我心里的某些角落仿佛也被打开了，我相信，即使未来我将从事同样的工作、我的作为也与病前并无太大差异，但我知道，我的心不会停留在过往的追寻上，我会随时提醒自己，让心更开放，以便倾听、探索更广大的未知事物，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尽力做我能做的事！

这个转变的过程，或许正是癌症要教给我的！

生病之前，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百大人物”之一，我意气风发地赴美受奖，自认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然而，吊诡的是，领奖回来没几个月，我就发现自己生病了。病中赤裸裸地暴露在病痛的风暴中，再大的影响力、再高的知名度都帮不了忙；在诊疗间、在病床上，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在呼吸之间顿失所有的病人。

那时候，我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对我不公平，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是因果报应吗？”我是天之骄子啊！我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我，怎么可能会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地里，跟一群凡夫俗子一样在这里挣扎求生？